

古代埃及教谕文献的产生背景

史海波

(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吉林长春 130012)

[摘要] 古代埃及的教谕文献是我们认识古代埃及人社会、伦理等方面思想的重要文献, 这种文献的起源、发展和结束的进程, 基本上和埃及古代文明的进程同步。由于这种文献的内容和玛阿特观念密切相关, 需要结合这种观念来考察教谕文献的产生背景, 包括自然的、社会的和历史的背景, 可以透视出教谕文献产生背景当中所蕴涵的二元对立的思想属性。

[关键词] 教谕; 玛阿特; 伦理

[中图分类号] K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8X(2006)06-0050-03

“教谕”(sbayt)是古代埃及最初产生的几种文体之一, 在古王国时期, 它和自传都是非常重要的文体。从内容角度讲, 教谕的基本内容是“履行玛阿特”(irm '3t), 虽然在各个时期教谕的内容都有相应的变化, 但大体上都涉及诚实、谦逊、自我控制、尊敬权威、同情弱者等等玛阿特问题。由于玛阿特这个概念同时具有宇宙论和伦理学两方面的抽象含义, 它既代表宇宙的秩序又代表社会的正义, 所以我们这里要讨论的“背景”就是和玛阿特观念相联系的教谕文献的产生背景。为了更为清晰地分析问题, 我们先看一下埃及人自己的说法。

一、神话、传说与教谕文献

按埃及人自己的说法, 托特是文字创造之神, 作为“神圣文字的主人”, 书吏们认为自己是“托特的追随者”, 他是书吏的保护神。他掌握着“生命之家”中的神圣诞籍, 而“生命之家”是一个受崇敬的资料中心, 只对书吏开放, 里面存放着完全受到托特保护的含有丰富知识的纸草文书, 例如医学手册、关于数学问题的文献以及关于社会礼仪的教谕文献^[1]。托特是和记录、文字、文学、智慧以及一切知识联系起来的, 他还被称为“神的话语(mdw-nt)的主人”, 所以托特是当之无愧的非常优秀的教导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托特和伦理思想的联系, 他有时以“正义之主”的形象出现: 托特, 南部希利欧波里斯的主人, 揭示玛阿特, 认识玛阿特的宰相(维西尔), 他热爱玛阿特, 把玛阿特给予玛阿特的执行者……^[2]

另外, 根据查斯毕四号纸草对古代圣贤的追述, 最早书写教谕的应该是伊姆霍特普^[3]。他是最早的和“教谕”相联系的“书吏”, 也是第三王朝左塞王的阶梯金字塔的设计者。他还是维西尔, 传说他写了很多教谕文献, 但是没有一篇流传下来。他的伟大学识使他受到了极大的尊敬, 在他死后 2000 年左右, 出现了神化他的证据: 他被认为是智慧、书写和医药之神。因此对他的崇拜经常和托特神紧密联系在一起^[4]。

综合托特和伊姆霍特普的记载,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 “美德”和“知识”、“教谕”和玛阿特是不可分割的。下面我们按照玛阿特这个概念的几个层面来逐步分析教谕文献产生的背景和条件。

二、教谕文献产生的自然条件

由于埃及相对封闭的环境, 周期的季节变化, 尼罗河的定期泛滥, 甚至由于少雨而每天都可见到的日出日落, 使其具有相对稳定和规律的自然环境, 这在塑造埃及人尊崇秩序和规则的性格方面产生了影响, 这种地理环境的影响, 在人类的童年时期表现得尤为显著。在古王国时期的金字塔铭文中, “玛阿特”具有明显

[收稿日期] 2006-08-11

[作者简介] 史海波(1973-), 男, 黑龙江绥化人, 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讲师, 历史学博士, 从事世界古代史和西方史学史研究。

的“秩序”含义，例如：“天空处于和平，大地在欢乐，因为它们听到[培比]要把玛阿特放入混乱的地方。”^[5]它象征着正确的世界定则，它的规则也适用于人类社会。“玛阿特”这个概念是古人用自然法则解释社会法则的典范。正是这种观念影响了埃及人的性格，在各历史时期的教谕文献中，理想的人格是谦逊、和蔼、自制、公正、正直等等，这是对宇宙规则的遵守。

按利希泰姆的观点，教谕文体的产生明显受到上述自然环境的影响，她认为：生活在等级社会之中的思想者们，认为人类社会的秩序即是宇宙秩序的镜像，就像太阳神每天通过其从不失败的巡回来统治宇宙一样，神圣的国王也保证着人类的秩序，在这种框架之内，对经验产生作用的实用思想加上宗教的感情和沉思，组合而成以简短的教导和以格言形式存在的信条，一系列的信条的组合就导致了教谕的创作。^[6]这里面所涉及到的“秩序”观念已经把玛阿特和教谕文献联系起来，并指出了教谕文献产生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

埃及的自然地理方面的相对优越确实造成埃及的文明成就有自然天成的一面，但我们不能因此忽视在文明的创造中人类的主观认知能力。实际上古代埃及的自然环境也有不利的一面，我们决不能无限地夸大太阳和尼罗河给埃及人带来的幸福生活。太阳、尼罗河、沙漠和三角洲都隐含着灾难和毁灭的力量。与埃及的邻国相比，埃及是富庶的和幸运的，可是就其自身而言，它也经历奋斗、贫穷和灾难，这些经历使埃及人每年的胜利变得更为真实可信，使人们产生一种感觉，即胜利并不是埃及人的特权，必须以牺牲某种东西为代价才能得到它。^[7]稳定的自然环境并不是尊崇玛阿特的原因，更为准确地说是在埃及人认识到自然界中的灾难在人类社会中有反映，即善恶的对立。玛阿特本身不能单独存在，它只有在和非正义的对立中才能表现出来，教谕文献的存在意义也展现于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当中，包括教谕文献提到的明智与无知、秩序与混乱以及善与恶的对立。

三、教谕文献产生的社会背景

首先，很多教谕文献被后世传抄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教谕符合王室对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的要求。在前王朝和早王朝时期，我们还不十分明确当时的政府职能和社会阶级的详细情况，但社会等级分化是完全可以确定的：国王的高大形象在蝎王权标头上已显露无遗。到古王国时期中央集权政府和社会等级的分化已经建立起来。一套主张推行玛阿特的官僚政府的存在为教谕文献的存在设定了一个基本前提。

国王和玛阿特的关系不同于普通臣民和玛阿特的关系，他是“正义之主”，他能运用玛阿特的权威，拥有玛阿特的品质，但他和众神一样，需要依靠玛阿特而生存，这也就从根本上确定了和玛阿特相关的教谕文献存在的可能和必要。

另外，宰相（维西尔）在产生和传播教谕思想方面起到了突出的作用。作为一种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关于“正义”的伦理教化产生的前提首先和官僚政府有关，不论从狭长的统治区域还是从历史的经验来讲，埃及都确实需要精心地管理，羸弱的政府管理会造成内部的混乱，政府的正常运转从理论上讲应该是建立在官僚机构和政府部门的公平、公正的基础之上。这样宰相的职能和设置传统十分有意义，不但是由于他在行政、司法和财政方面的重要的管理角色，而且还因为：（1）他要对王子进行正式的王室教谕，这也是他应该执行的职责；（2）他要为继承宰相职位的人写下教谕，古王国时期的“对凯格姆尼的教谕”和“普塔霍特普的教谕”就是宰相为儿子和王子所作。教谕的书写，最初基本上是为玛阿特的领导者和公职人员建立伦理空间的，教谕文体正是通过教导、传承和发展，才变成一种全民集合式的道德焦点和遗产^[8]。

书吏阶层对教谕文献的推广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正是他们倡导并努力去建立一个理想的正义社会，而且，书吏作为伦理的教导者，提供了一种由道德文化支撑的关于正义的领导阶层的哲学范式，并以此作为达到理想的正义社会的关键，这种范式为大规模的伦理系统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哲学框架和背景^[9]。书吏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充裕的收入、美好的名声，而且他是少数能操纵书写符号的人，书吏这一职业实际本身就与古埃及的官僚体制、教育制度、伦理思想等密切相关。

四、教谕文献产生的历史背景

直到第一中间期，由于有强大的集权政府的庇护，以及有自给自足的经济、有力的军队和天然的地理屏障作后盾，埃及一直处于和平时期，在此期间埃及平稳地向前发展，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不但在建筑、艺术、科学等方面成就巨大，而且在伦理思想上也颇有进步。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把埃及平稳发展的时期推移

到中王国时期，因为第一中间期的地方贵族分权割据以及大饥谨所持续的时间并不久。另外，尽管埃及在前王朝时期就和域外有所往来，早王朝和古王国对外都进行过战争，但在这段时期埃及人是强大的，边境上的胜利更多地鼓舞了埃及人的自信心。

但在历史背景上，古埃及人实际上总是关注秩序与混乱这一对立因素，甚至在国家起源的神话传说中，他们就运用荷鲁斯和塞特这样代表正义和邪恶的象征性表达方式。这种二元对立的表述手法在以后的历史中被反复强调，在法老埃及的各个历史时期，关于国王驱除混乱、恢复秩序、击败外族人的记载屡见不鲜，这种叙述“历史功绩”记载甚至被后世的国王窃用。在教谕作品甚至一种教谕思想产生之前，埃及的历史发展历程已经让人们知道了关于战争与和平、秩序与混乱、正义与邪恶的存在和对立。前王朝时期各州之间的斗争，包括侵略与自卫、掠夺与抗争，这在埃及人的观念中一定留下印象。所以从历史背景来看，我们毋宁说是埃及人看到了历史中秩序与混乱的对立，而不单单把历史的进程理解为稳定、和平的传统生活方式的延续。

这样，“历史”为教谕文献所提供的也是一种“混乱”与“秩序”相对立的背景，正如荷鲁斯与塞特的斗争的结局一样，历史进程中的秩序与混乱的对立的结局不能通过二者的平衡或妥协来解决，必须是一方战胜另外一方，历史中的混乱最终都要被秩序取代。教谕文献中所描述的玛阿特行为的回报以及邪恶行为的失败，和历史背景中“秩序”的确立与“混乱”的消退是一致的。

从埃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文献资料看，实际上真正把古代埃及的宗教观念和伦理观念连接起来，并比较完整地反映什么是玛阿特的文献其实就是教谕文献，而对这种文献产生背景的探讨实际上是在各个角度把玛阿特观念和古埃及社会情况连接起来，这样我们的研究就延伸到其它领域，从而深化和细化了我们对玛阿特观念的认识。最主要的是，我们在对和玛阿特观念相联系的教谕文献的产生背景的分析中看到了埃及人思想中的二元对立因素，这样我们就更为深刻地理解了在众多的具有对称的、对立或某种对应关系的艺术品之后的思想因素。

[参 考 文 献]

- [1] G. Hart. *A Dictionary of Egyptian Gods and Goddesses* [M]. New York: Routledge, 1986.
- [2] K. A. Kitchen. *Ramesseid Inscriptions, Historical and Biographical* [M]. Vol1. Oxford, 1975 - 1990.
- [3] M. Lichtheim.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A Book of Readings (AEL)* [M]. vol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 [4] I. Shaw, P. Nicholson. *British Museum Dictionary of Ancient Egypt* [M].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6.
- [5] S. Kurt. *Die Alt?gyptischen Pyramidentexte (Pyr)* [M].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Darmstadt, 1960.
- [6] M. Lichtheim.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A Book of Readings (AEL)* [M]. vol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 [7] 郭丹彤. 论自然环境对古代埃及文化的影响 [M]. 东北师范大学报, 2000(4).
- [8][9] M. Karenga. *Towards a Sociology of Maatian Ethics: Literature and Context*. In: *Egypt Revisited* [M]. ed Sertima I V.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1991.

The Generative Background of the Teaching Text of Ancient Egypt

SHI Hai - bo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e teaching text, that exists in the long time of ancient Egyptian civilization,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to study social ethic ideal of ancient Egyptian. teaching text's content relates to Maat tightly. So we need to cooperate this ideal to study the original background including natural, social and historical aspects so as to perspect the duarul idea which included in the generative screen of the teaching text.

Key words: teaching; background; maat; ethic